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面對21世紀全球化時代多元複雜多變的世局，尤其高等教育由過去的菁英教育走向普及教育，學者普遍認為，通識教育扮演提升大學教育基礎品質之關鍵角色，如果只接受狹隘的專業教育，將難以培育學生自主判斷、反思及面對複雜多變世界的處遇能力；而大學通識教育正可以提供廣博且均衡的學習內容，引導與啟發學生對於其他學科的興趣，以培養宏觀的知識基礎和獨立思辨的能力（黃俊傑，2007）。然而，通識教育在本國為20世紀興起的新名詞，師資與課程教學內容因而形成問題，台灣這幾年推動改革計畫，基本上是借鏡西方博雅教育來發展本國通識教育。

在西方博雅教育的發展過程中，立足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學，其通識教育改革具有其代表性。哈佛大學創校於1636年，當時的教育即為古典的博雅教育，注重人文學科，所有課程皆為共同必修。直至今日進入21世紀，哈佛大學部的教育（由哈佛學院負責）已由「傳統共修制度」轉變為「通識教育+專門教育」之課程模式，期間為適應時代變化，在歷屆校長領軍下進行數次課程革新。尤其通識教育之變革，更可做為我國通識教育發展之參考。本研究透過讀書會方式研討哈佛大學近幾次通識課程改革的重要文獻資料，並進行意見交流與深入討論，提出其改革對我國通識教育之啟示。

貳、文獻回顧

本節首先追溯西方博雅教育的理念與內涵，觀察美國如何承襲這個傳統來型塑當今之通識教育，然後反觀本國通識教育之發展，接著回顧哈佛大學近幾次課程改革，以建立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一、從西方博雅教育到現今美國通識教育

一般普遍認為，起源於古希臘時代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為通識教育的前身，博雅教育指的是自由公民的教育，而不是奴隸的訓練，所以又稱為「自由教育」，係指透過心智的訓練，培育希臘城邦的公民具備知識與德行的素養（鄒川

雄，2008)。這種原本屬於王公貴族的菁英教育，後來被賦予心靈解放之意涵，指接受過「自由教育」可使人成為具有自由心靈的人，不僅知道如何主導自己的思想，也能對所屬社會的規範與傳統進行批判性的省思（Nussbaum, 1997）。這個意涵也成為後來通識教育重要的核心精神——強調人的主體性。博雅教育的教育內容即為所謂的「博雅七藝」：文法、修辭、邏輯、算數、幾何、天文及音樂，前三科為基礎學科，後四科被視為數學的分支。當時強調數學訓練的重要，其目的不在於實際運算，而在於進行心智訓練，以為更高深的「哲學」或「辯證法」學習做好準備；後來中世紀大學體制建立起來，博雅七藝即成為其重要的教育內容，被視為進入更高深專業研究的預備教育，成為大學教育的核心（鄒川雄，2008）。

美國高等教育在英國殖民地時期，係由基督教各教派創立，其設校之主要目的在培養牧師和律師，其課程承襲歐洲大學的傳統，特別是英國牛津和劍橋大學，以傳授博雅七藝為主，稱之為博雅教育。美國獨立與內戰結束之後，認為大學要培養的是建設國家所需的士農工商各行各業的人才，並且受到德國大學學術自由和注重研究的影響，開始質疑傳統古典文雅學科的功用與價值，於是，大學開始教授現代語、自然科學、法律政治等實用職業導向課程，課程朝向多樣化發展（黃坤錦，1999）。「通識教育」一詞，隨著美國現代研究大學興起，於1880~1920年間出現；推翻過去共同必修的傳統博雅教育，大學制度轉變為主修和選修系統，通識教育成為專門教育主選修課程所無法提供的必要補充教育（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Harvard University, 2005）。

美國發展的通識教育，經過多次不同學府的教育改革及教育學者的辯論，逐漸對於通識教育之內涵有了共識。其中，最主要的四個改革事件分別為：1917年哥倫比亞大學之西方文明通識課程的設立；1930年代芝加哥大學開展的西方經典鉅著的教學；1970年代哈佛大學核心課程的規劃；以及1988年史丹福大學檢討Plato著作是否可列為通識教材所引起的風波（林孝信與黃俊傑，1996）。也因此發展出美國通識課程之主要理論有理想常經主義、進步實用主義和精粹本質主義（黃坤錦，1999）。理想常經主義以Newman主教和芝加哥大學校長Hutchins為代表，認為大學是高級心智的涵養，注重古典文雅學科的永恆價值，主張大學以文雅教育為主幹，而又以經典名著為全體學生必修的課程；課程注重指導性的安排，其所發展出之課程模式以芝加哥大學的分類必修（distribution requirements）為代表。進步實用主義以Dewey和加州大學系統總校長Kerr為代表，以學生興趣為中心的自由選修，其理念為宇宙社會中並沒有所謂的永恆不變，強調個人的不同生活經驗與需要，其所